



汉泰量词对比下对泰汉语量词教学策略启示

Cross-linguistic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Thai Classifier Systems: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Chinese Classifiers to Thai Learners

李斌¹

LI BIN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院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mprakiet University

E-Mail : 807672642@qq.com

杨绪明²

YANG XUMING

南宁师范大学、国际学院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P.R. China

E-Mail : 375549460@qq.com

Received: 17 July 2025/ Revised: 23 November 2025 / Accepted: 28 November 2025

摘要

随着国际中文教育在泰国不断拓展，对汉、泰语量词教学研究逐渐受到关注，但相较于其他方面，在指导对汉、泰语量词教学的汉、泰量词系统对比研究方面，仍有待进一步丰富。基于这一现状，本论文聚焦汉泰量词对比研究评述及对泰汉语教学启示，全面梳理国内外“量词概念”研究的发展脉络，深入剖析汉语与泰语量词在分类、语义功能、语法功能及语用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比发现，汉、泰量词在表达数量概念、部分语义范畴以及句法基本结构上存在共性，但在分类体系、语义精细度、句法搭配灵活性及语用文化内涵等维度差异明显。当前研究存在泰语量词理论研究不够深入，汉、泰对比分析不够全面以及二语教学针对性策略缺乏等问题。为此，提出打造复合型教师队伍、构建专用语料平台、开展情境化分层教学、开发本土化智能教学系统等策略，旨在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推动对汉、泰语量词教学朝着科学化、精准化方向稳步发展。

关键词：量词概念；汉、泰量词；对比研究；二语教学；启示



ABSTRACT

A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ontinues to expand in Thailand,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lassifiers to Thai learners has gradually garnered attention. However,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Chinese-Thai classifier system for guiding Chinese and Thai classifier instruction remain to be further expanded and enriched. Based on this current situ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a review of comparative studies on Chinese and Thai classifiers and their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Chinese to Thai learners. It comprehensively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of classifier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and delves into an analysis of research findings on the classification, semantic functions, grammatical functions, and pragmatic strategies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 and Thai. Through comparison, it is found that Chinese and Thai classifiers share commonalities in expressing quantitative concepts, certain semantic categories, and basic syntactic structures. However, they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lassification systems, semantic granularity, flexibility in syntactic collocation, and pragmatic cultural connotations. Current research faces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ly in-depth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ai classifiers, incomplete comparative analyses between Chinese and Thai, and a lack of targeted strategies for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To address these gaps, this paper proposes strategies including cultivating a composite teaching team, constructing a specialized corpus platform, implementing context-based tiered teaching, and developing localized intelligent teaching systems.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compensate for the current research deficiencies and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precis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classifiers to Thai learners.

Keywords: concept of classifiers; Chinese and Thai classifiers; comparative study;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implications

引言

量词作为语言系统中用以表示事物数量单位或动作行为次数的特殊词类,在语言交际里承担着精准表达数量概念、辅助语义传达以及体现语言文化特色的重要功能,在跨语言交流与二语教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汉语属于孤立语,而泰语属于壮侗语族语言,有着与汉语不同的语言类型特征,汉、泰语量词系统在语音、语法及语用层面呈现出显著差异。中泰两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不断深入,对泰汉语教学需求不断增长,然而,目前汉、泰语量词对比研究及教学实践仍存在诸多不足。泰语量词研究虽已取得一定进展,但

整体起步较晚，系统性研究尚显不足，针对量词语义演变及语用功能的深层挖掘尚待加强。汉、泰量词对比研究多局限于表层的词汇对应，对二者在语音特征、语法功能及语用策略等方面的深层差异及其文化动因探讨不足。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与针对性教材，学习者在量词习得过程中易产生混淆与误用，习得难度较大。这不仅制约了对泰汉语教学质量的提升以及在中国的泰语教学质量的提高，也影响了中泰语言文化的有效交流与传播。泰国学习者由于对汉语量词的理解和运用不准确，可能会在与中国人交流时产生误解，影响交际效果；同样，中国学习者在学习泰语量词时遇到困难，也会影响对泰语文化的深入理解。因此，深入开展汉、泰语量词对比研究，探究科学的教学策略，对推动对泰汉语教学发展、促进在中国的泰语教学进步以及实现中泰语言文化的深度互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量词界定”的研究梳理

（一）国外学界对“量词界定”的研究

西方语言学界关于“量词”的研究具有丰富历史与多元理论视角，不同学者依据各自研究目的和理论框架给出了不同层次的定义与分析。

传统语义学领域：约翰·莱昂斯《语义学》（1977），通过研究语义学概念，包括有限集、类别表达范围与数量表达机制。其将量词放在语义体系中讨论，但书中并不提供一个单一、严格的形式定义，而是通过语义学理论框架解释这类表达如何与名词短语含义组合。该著作虽不是专门为量词提供独立的定义条目，但其对量词的论述成为后者对语义学、语言类型学研究的铺垫。

逻辑语义学领域：巴维丝、库珀《广义量词与自然语言》（1981），是广义量词理论的标志性成果，将自然语言中各种量词的表达放在模型论框架下分析。在这一理论中量词被解释为“某种集合对其他集合的关系”（即一类数学对象，通常为集合的集合或两个集合之间的关系），例如，most 是一种比较集合大小的二元量化关系，而 every 则是子集关系。该理论比传统逻辑中的 $\forall$ （全称）和 $\exists$ （存在）更丰富，能解释自然语言大量数量表达的语义特征。

形式语义学扩展：基南、斯塔维《自然语言限定词的语义特征刻画》（1986），在广义量词理论基础之上，进一步证明广义量词理论能统一解释不同类型的量化表达，同时形成了广义量词范式在自然语言语义中的标准解释。

虽然上述形式语义学框架是量词定义研究的核心，语言类型学与认知语言学也关注量词在不同语言中的分布、表达方式和认知策略差异。例如，丽莎·马修森（2001）在《量化与跨语言变异的本质》中指出量词表达方式在不同语言中可能通过不同策略实现，这体现出自然语言数量结构的多样性。

综上所述，国外学界关于“量词界定”的主要成就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观点：



基本语义定义视角：在语言学术语层面，量词被视为表达数量关系的限定词/修饰词。

传统语义学视角：基础语义学教材将这类表达置于一般语义体系中，但不给出严格数学定义。

形式语义学视角：将量词解释为集合/关系，提供严格的模型论语义框架。

类型学与认知视角：量词的表达具有语言多样性的特征。

相同点在于各类研究都承认量词在语义结构中具有核心数量表达功能，是理解自然语言中数量关系的关键语义类别；而不同点在于传统语义学更关注语义意义的系统描述；形式语义学将量词置于数学逻辑关系中；类型学与认知取向强调语言与认知、语用之间的互动差异。

(二) 国内学界对“量词界定”的研究

国内学界对“量词”的研究源远流长，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不同学者在不同时期基于各自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对量词的定义给出了丰富多样的阐述。

早期，量词的研究主要蕴含在对汉语词类系统的初步探索之中。马建忠在《马氏文通》（1898）里虽未明确提出“量词”这一术语，但在论述汉语词类时，已涉及到与数量相关的表达成分，为后续量词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由于当时研究重点在于构建汉语语法体系的大框架，对量词这类具体词类的专门探讨尚不深入，未对其概念进行清晰界定。

20 世纪上半叶，随着汉语语法研究的不断推进，量词逐渐受到更多关注。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法》（1924）中，将量词归入体词范畴，并进一步细分为物量词和动量词。他指出物量词用于表示事物的数量单位，如“个、只、条”等；动量词用于表示动作的数量单位，如“次、回、趟”等。这种分类方式为量词研究提供了清晰的框架，但此时对量词的定义仍较为宽泛，主要侧重于从功能角度描述其用途。

吕叔湘在《中国语法要略》（1942）中，对量词的研究有了更深入的拓展。他认为量词是“表示事物的单位或动作的单位的词”，不仅涵盖了物量词和动量词，还注意到量词与名词、动词之间的搭配关系。他指出量词的选择往往受到名词语义特征的制约，例如“一张纸”“一把刀”，不同的名词需要搭配不同的量词，这反映了量词在语义上的精细分类功能。不过，此时对量词的定义仍停留在较为直观的层面，尚未深入探讨其语法地位和内在规律。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汉语语法研究在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丁声树等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中，对量词的定义更加明确和系统。他们认为量词是“表示计算单位的词”，并将其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大类。名量词用于计量人或事物的单位，动量词用于计量动作的单位。这种定义强调了量词的基本功能是表示数量单位，同时对量词的分类更加科学合理，为后续量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等新兴理论的引入，量词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朱德熙在《语法讲义》（1982）中，从语法功能的角度对量词进行了定义。他认为量词是“能够放在数词后头的黏着词”，并且根据量词与名词的组合关系，将

量词分为个体量词、集合量词、度量词等。这种定义突出了量词的语法特点，即其黏着性和与数词的紧密搭配关系，同时也进一步细化了量词的分类，使量词研究更加精细。

邵敬敏在《现代汉语量词研究》（1993）中，对量词的定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他认为量词是“表示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并且强调量词具有“双向选择”的功能。一方面，量词的选择受到名词语义特征的制约，不同的名词需要选择与之相匹配的量词；另一方面，量词一旦选定，也会对名词的语义产生一定的反作用，赋予名词新的语义内涵。例如，“一杯茶”中的“杯”不仅表示数量单位，还使“茶”具有了以“杯”为容器的语义特征。这种定义揭示了量词与名词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化了人们对量词本质特征的认识。

21 世纪，随着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的发展，量词研究又有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一些学者利用大规模语料库对量词的使用频率、搭配模式等进行统计分析，进一步揭示了量词的分布规律和使用特点。例如，李宇明在《汉语量词研究》（2020）中，结合语料库数据和认知语言学理论，对量词的定义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认为量词是“汉语中用于量化名词或动词的词类，它通过与数词、名词或动词的组合，表达出精确或模糊的数量概念，并且反映了汉语使用者对事物的认知方式和分类体系”。这种定义不仅强调了量词的量化功能，还突出了其与认知和文化的紧密联系。

此外，学界还关注到与量词相关的“分类词”术语。一些学者认为，汉语中的量词与一些语言中的分类词具有相似功能，都用于对名词进行分类计量。例如，陆俭明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2005）中指出，汉语量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分类词的特点，能够根据事物的不同特征进行分类，如根据形状、功能、材料等。但同时也他强调，汉语量词与分类词在语法功能和使用特点上仍存在一定差异，不能简单等同。

综上所述，现代汉语学界对“量词”的定义经历了从宽泛到精确、从单一功能到多元功能的发展过程。早期定义主要侧重于量词的基本功能，即表示数量单位；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量词与名词、动词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量词在语义、语法和认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尽管目前学界对量词的定义尚未完全统一，但普遍认为量词是汉语中一类具有独特语法功能和语义特征的词类，它通过与数词、名词或动词的组合，表达出丰富的数量信息和认知内容。因此，现代汉语中的“量词”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涵盖了表示数量单位、事物分类、认知特征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二、汉、泰量词研究综述与对比

（一）汉语量词研究

1. 分类与界定

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量词范畴的界定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量词的界定、分类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多种观点。

量词作为汉语词类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称谓的确立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演变和学术发展过程。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1924)中首次使用“量词”术语,将其视为名词的次类,定义为“表数量的名词,添加在数词之下,用来作所计数的事物之单位”,并进一步细分为借用个体名词作量词和专表数量的度量衡单位词两类。这一时期的研究为量词范畴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尚未形成独立的词类体系。马建忠在《马氏文通》(1898)中虽未明确提出“量词”这一术语,但已注意到与数量表达相关的语言现象,将相关成分归入“名字”的次类,认为其具有“记数之别称”的功能。高名凯《汉语语法论》(1948)中提出“数位词”概念,将量词分为度量衡单位、部分词和范词三类,强调量词的分类标记功能。吕叔湘在《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中将量词划分为九类,包括个体量词、集合量词、部分量词、容器量词、临时量词、度量词、自主量词、动量词和复合量词。朱德熙《语法讲义》(1982)则提出7类分类法,涵盖个体量词、集合量词、度量词等。刘月华等在《实用现代汉语语法》(2001)中进一步简化,将量词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大类,并细分为专用量词、借用量词等子类。何杰在《现代汉语量词研究》(2001)中将量词分为名量词、动量词、兼职量词和复合量词,其中名量词又分为个体量词、部分量词、集合量词、借用量词和临时量词。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2002)中将量词分为四大类,包括名量词、动量词、时量词和自主量词。尽管在分类角度和标准上存在差异,但是对量词的进一步细分尚未有具体的标准。

综合前人研究,本文对汉语量词所研究的界定主要包含以下几个类别:个体量词、集合量词、容器量词、度量词、动量词。

2. 语音特征

音节结构:包括单音节量词和双音节量词等。不同音节结构的量词在语音上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单音节量词在汉语中占据主导地位,其语音简洁明快,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例如,赵元任在《中国话的文法》(1968)中提到,单音节量词的语音具有极强的附着性,它们通常紧密地附着于数词或名词之后,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语音单元。例如,“三本书”“五张桌子”中,“本”和“张”作为单音节量词,与数词和名词的结合紧密,语音流畅自然,符合汉语的语音习惯;

声调:对量词语音的研究离不开对其声调特征的分析。例如,朱德熙《语法讲义》(1982)中指出,部分量词在与其它词组合时,声调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与语义和语法功能紧密相关。例如,“个”作为使用最为广泛的个体量词,在单用时读本调去声,但在一些固定短语或特定语境中,声调会发生改变。如在“这个”“那个”中,“个”读轻声,这种轻声现象不仅使语音更加和谐自然,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词语的语法地位,使其更紧密地附着于指示代词,起到强调指示对象的作用。

轻重音:轻重音是汉语语音中的重要现象,量词在句子中的轻重音位置会影响句子的语义和语法结构。一般情况下,量词在数量短语中读轻声,这种轻声现象使量词与数词的结合

更加紧密，突出了数量短语的整体性。例如，“两个苹果”中，“个”读轻声，强调的是“两个”这一数量概念与“苹果”的搭配关系。然而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中，量词会读重音，以起到强调或突出特定语义的作用。例如，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1985）中举例说明，当我们要强调数量时，量词会读重音。如“我就要那一个！”中，“个”读重音，突出了对特定个体的选择和强调。此外，在一些对比语境中，量词读重音还可以起到区分和对比的作用。例如，“这本书和那本书不一样，这本厚，那本薄。”中，“本”分别读重音，清晰地对比了两本书的不同特征。

语流音变：在连续的语流中，量词的语音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这种语流音变现象反映了汉语语音的动态特征。石锋在《汉语语音习得研究》（2018）中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发现，量词在语流中容易受到前后音节的影响，发生同化、异化、弱化等音变现象。例如，当量词“个”前面的音节是舌根音“g、k、h”时，“个”的发音会受到同化作用，舌根位置更加靠后，发音更接近“ge”的变体；而当量词“张”后面的音节是鼻音“n”时，“张”的韵尾“ng”会受到异化影响，发音更加清晰。

弱化现象也是量词语流音变中的常见现象。在快速语流中，一些量词的发音会变得轻短模糊，甚至出现脱落的情况。例如，“他们三个人”在快速朗读时，可能会读成“他们仨人”，其中量词“个”发生了弱化甚至脱落现象。这种语流音变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量词的原有语音形式，但并不影响语义的表达，反而是汉语语音适应语流节奏和交际需求的一种体现。

3. 语法功能

（1）量词与数词的组合：量词与数词的组合是汉语数量短语形成的基础，也是量词最基本、最重要的语法功能之一。朱德熙（1982）在《语法讲义》中指出，数词与量词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语法联系，二者组合成数量短语后，能够更准确地表示事物的数量或动作的次数。例如，“三本书”中的“三”是数词，“本”是量词，二者组合后形成了表示数量的短语“三本”，用于修饰名词“书”。近年来，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了数词与量词组合的灵活性及其语法效应。马庆株《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2002）提出数词和量词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数词对量词的选择上，以及量词对数词的回应上。例如，某些数词可能更倾向于与特定的量词组合，而某些量词也可能对数词有特定的要求。

（2）量词的重叠使用：量词的重叠使用是汉语量词语法功能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吕叔湘（1980）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指出，量词重叠后能够表示数量的增多或动作的反复，同时带有一定的强调意味。例如，“个个都是好样的”中的“个个”是量词“个”的重叠形式，表示“每一个”的意思，强调了无一例外。近年来，学者们对量词重叠的语法功能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侯友兰（1998）在《量词重叠的语法语义分析》通过语料分析揭示量词重叠的语法意义随句法功能变化的规律，例如 AA 式重叠在主语位置表示“每一”义，在定

语位置则可能表示“多量”义等。何杰（2000）《现代汉语量词研究》对量词重叠的语法功能进行了深入探讨，该书系统分析了量词重叠的多种形式及其句法分布特征，如，AA 式、一AA 式和 AABB 式等重叠结构在主语、定语、状语等不同句法位置上的功能差异。

（3）量词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量词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及其功能是汉语量词语法功能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邢福义（2025）在《汉语语法学》中指出，量词在句法结构中主要充当定语或补语，用于修饰名词或动词。例如，“一本书”中的“本”是量词，充当定语修饰名词“书”；“跑一趟”中的“趟”是量词，充当补语补充说明动词“跑”的次数。近年来，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了量词在句法结构中的灵活性和多功能性。张卫东（2025）在《再论中古见组细音变同精组》中提到，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量词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逐渐变得灵活多样。例如，在某些语境下，量词可以单独充当句子成分，如“个”在口语中常被用作主语或宾语，如“这个不错”、“我喜欢个大的”。此外，量词还可以与其他词类组合成新的短语或句子成分，如“量词短语”、“量词性从句”等。

4. 语义功能

量词的基本语义功能在于表示事物的数量或计量单位，这是量词最核心、最普遍的功能。朱德熙（1982）在《语法讲义》中指出，量词与数词组合成数量短语，能够准确地表示事物的数量，如“三本书”“五斤大米”等。这种数量短语在汉语中应用广泛，是表达数量关系的主要手段。量词不仅可以表示具体的数量，还可以表达抽象的数量概念。例如，“一次旅行”“一番努力”中的“次”和“番”就是表示动作或变化的抽象数量单位。这种抽象数量单位的表达，使得汉语在描述复杂事物或概念时更加灵活和准确。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量词的语义功能远不止于表示数量，还可以根据语义特征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何杰（2008）在《现代汉语量词研究：增编版》中，将量词分为个体量词、集体量词、容器量词、度量衡量词、不定量词、复合量词和借用量词等多个类别。这种分类不仅揭示了量词在语义上的多样性，也为深入研究量词的语义功能提供了基础。例如，个体量词如“个”“只”“条”等，用于表示单个事物的数量；集体量词如“群”“批”“套”等，则用于表示多个事物的集合。这种分类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量词在不同语境下的语义功能。近年来，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如张谊生，2018）发现，量词的语义功能在口语交际中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特点。语境对量词语义的选择和表达具有重要影响，同一个量词在不同语境下可能产生不同的语用意义。例如，“个”作为汉语中最常用的个体量词，在口语中几乎可以修饰所有名词，如“一个苹果”“一个人”“一个想法”等。然而，在不同的语境下，“个”的语义可能有所不同。在“他真是个好”中，“个”更多地表示一种泛指或类属；而在“这个苹果真甜”中，“个”则明确指代了具体的苹果。这种语境对量词语义的影响，体现了汉语量词语义的复杂性和灵活性。

5. 二语习得偏误与教学实践

欧阳晓芳 (2019) ใน《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偏误分析》中聚焦外国学习者在汉语习得过程中产生的语言偏误现象发现具体偏误特征如下：

语音偏误的阶段性特征：初级阶段，声调偏误率较高，学习者可能难以准确把握汉语的四个声调，导致发音不准确。同时，韵母发音部位偏差也是初级阶段常见的语音偏误。中高级阶段，随着学习时间的增长和汉语水平的提高，声调偏误率逐渐降低。学习者对汉语语音系统的熟悉程度增加，能够更准确地发音；

词汇偏误的阶段性特征：初级阶段，词汇偏误主要表现为近义词误用、搭配失当等。学习者可能对汉语词汇的语义和用法不熟悉，导致使用不当。中级阶段，随着词汇量的增加和汉语水平的提高，近义词误用和搭配失当的偏误率有所降低。但学习者可能开始面临更复杂的词汇问题，如多义词的辨析、成语和俗语的使用等。高级阶段，词汇偏误率进一步降低，学习者能够更准确地使用汉语词汇。但仍然可能存在一些高级词汇的偏误，如专业术语的使用不当等；

语法偏误的阶段性特征：初级阶段，语法偏误主要表现为句子成分残缺或多余、语序不当等。学习者可能对汉语的语法规则不熟悉，导致句子结构不完整或语序混乱。中级阶段，随着对汉语语法规则的逐渐熟悉，句子成分残缺或多余和语序不当的偏误率有所降低。但学习者可能开始面临更复杂的语法问题，如虚词的使用、复句的构造等。高级阶段，语法偏误率进一步降低，学习者能够更准确地运用汉语语法规则进行表达。但仍然可能存在一些高级语法的偏误，如特殊句式的使用不当等；

语用失误的阶段性特征：初级阶段，语用失误主要表现为文化差异导致的交际策略失当。学习者可能不熟悉中国的文化习俗和交际方式，导致在交际中出现尴尬或误解的情况。中级阶段，随着对中国文化的逐渐了解和交际经验的增加，语用失误率有所降低。但学习者可能仍然会遇到一些文化差异带来的交际难题，如礼貌用语的使用、拒绝表达的方式等。高级阶段，语用失误率进一步降低，学习者能够更得体地运用汉语进行交际。但仍然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际需求。

刘祥友 (2012) 在《对外汉语偏误分析》分析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语音、词汇、语法及语用等方面的偏误现象，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建议。具体为：

偏误成因：母语负迁移，学习者的母语规则对目的语学习产生干扰，导致偏误。例如，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在使用汉语疑问句时，可能将内容按照英语语序讲出，从而产生偏误；目的语知识负迁移，学习者对目的语规则的不充分理解或过度泛化，导致偏误。例如，学习者可能将“都”解释为“全部”或“全”的意思，并在不恰当的语境中使用；文化迁移，母语文化对目的语学习产生干扰，导致偏误。例如，外国学生可能直接称呼老师的姓或名，而不了解中国人的姓、名排列顺序和称呼习惯；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的影响，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采用的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可能导致偏误。例如，学习者可能因害怕犯错而回避使用某些语言形式；学习环境的影响，教师、教材等学习环境因素也可能导致偏误。例如，教师讲

解不周全或教材注释不准确可能引发学生的偏误。他提出,教师应具备偏误分析的能力,能够识别并分析学生的偏误类型和成因,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关注学生的学习进展和反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以提高教学效果。教材编写者也应考虑学习者的偏误特点和教学需求,编写科学、合理的教材以辅助教学。

综上所述,汉语量词其习得一直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CSL)教学的难点。汉语量词的应用研究多聚焦于二语习得偏误及教学实践,成果主要集中在偏误类型分析、影响因素探究以及教学策略优化等方面,但对量词的语义特征和语用功能研究不足。汉语量词丰富多样,不同量词具有独特的语义内涵和语用环境,学习者难以准确把握其语义和语用规则,导致使用不当。其次,缺乏对量词习得过程的研究,对学习者量词习得过程及教学策略的研究关注不够。了解学习者在不同学习阶段量词的习得情况、发展规律以及影响因素,有助于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促进学习者的量词有效习得。

(二) 泰语量词研究

针对泰语量词本土研究与系统性研究相对较少,需参考部分国内学者研究成果,通过查询文献梳理后可归纳以下特征:

1. 分类与界定

泰国皇家研究所《量词标准书》(2008)中将泰语量词分为6种类别,分别是个体量词、集合量词、形态量词、计量量词和度量词、动量词、重复名称量词。皇家研究所为泰国语言学权威机构,泰国泰语量词分类也将此书作为量词分类的统一标准。安佳丽·辛诺伊《泰语名词分类标记》(2016)中提出泰语量词研究不应仅限于“数量计数”的功能,而应在名义分类系统的语法与语义层面进行整体考察,她提出将泰语分类系统划分为三类:名义量词、类别词与类别标记,并指出量词在泰语名词短语中主要承担词汇-句法接口的分类与计量功能。该研究表明泰语量词在本土语法研究中的定位已经从早期的“计数单位”逐步转向更为精细的分类学、功能语法体系。裴晓睿等《泰语语法》(2017)中提出两类法,包括名量词和动量词,名量词又进一步细分为五小类:个体量词、度量词、集合量词、临时量词和自主量词。

综合前人研究可见,中泰学者均致力于剖析泰语量词的特征、分类及功能,并尝试通过系统分类厘清泰语量词体系。二者的差异在于研究视角:泰国本土研究突破了单纯的“数量计数”局限,侧重于功能语法视角,指出量词在名词短语中主要承担词汇-句法接口的分类与计量功能;而中国学者则侧重于精细分类,通过区分名量词与动量词、并进一步细分名量词,以帮助二语学习者更好地掌握泰语量词的使用规律。

2. 语法功能

依常生 (2020) 在《泰语量词的语法分布与语法功能》中研究表明泰语量词主要具有三种语法分布: “名—数—量”、“名—量—修”、“量—名”, 分别对应三种主要功能: 计量单位、指称单位和构词单位, 泰语还具有“数—名”、“量—名—限”、“量—名—形—限”、“名—量—形—限”等分布, 说明泰语量词语法功能还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乌冬·瓦罗塔玛西卡迪特 (2010) 在《句子与动词短语分类》中指出泰语量词属于名词短语结构的语义标记功能项, 通常出现在名词之后, 与数词结合标示数量与类别。在标准泰语语法中, 出现数量表达时, 量词是不可或缺的语法成分。

因此, 可以明确的是泰语量词被界定为功能性分类词类, 主要用于与数词结合以表达名词的数量单位和类别特征, 是泰语名词短语的核心语法成分。在结构与功能研究上, 本土学者不仅关注其基本计数功能, 还从语义分类、句法分布、语用差异等维度展开深入分析, 这些成果构成了泰语量词研究在本土语法学界的理论基础。

3. 语义功能

贾图荣卡乔克《量词与准则违反》(2019) 中提出泰语量词在语言使用中的语义与语用价值, 挑战了“量词是没有语义意义的纯功能语素”的传统观点。作者通过问卷与场景测试发现: 泰语量词在真实语境中具有实际语义作用与语用目的, 即使用量词违反常规也能达到特定的交际效果。结果显示泰语量词在沟通目标达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这对理解泰语量词的分类和应用具有重要启发。米斯里 (Meesri, W.) 等《素可泰碑文与现代用法中量词的差异》(2024) 中发现古苏哥泰碑铭中量词语义更加狭义且某些分类词已不同于现代用法, 可分为六类 (如类型分类、类别分类、形状、计量单位、状态类、重复名词分类等)。结果表明现代泰语量词系统在语义和使用上比古代更广泛, 同时某些古代分类机制已被今日系统所替代。

(三) 汉、泰语量词研究综述对比

当前汉、泰语量词对比研究成果相对有限, 特别在泰国本土相关方面研究较少, 经过系统梳理如下:

袁焱 (2006) 在《汉泰名量词比较研究——从泰国学生偏误谈起》中, 以名量词为研究对象, 从泰国学生汉语习得中的量词偏误入手, 通过深入探讨了汉、泰两种语言名量词在类型、语义、结构等方面的异同后发现: 类型方面, 汉、泰名量词在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泰语有反响型量词, 而汉语有复合量词。例如, 泰语中存在与被限定名词语音形式相同的专用量词 (反响型量词), 而汉语中则没有这类量词; 语义方面: 量词语义的差异受到文化和认知的制约。汉、泰名量词在语义上既有相似之处, 也有显著差异。例如, 有的名量词在泰语中具有计数的功能, 这一特点在泰语中尤为突出, 而在汉语中则不明显;

结构方面：从句法结构和量词的重叠两方面对汉、泰名量词进行了对比。例如，汉语和泰语在量词与名词的搭配顺序上存在差异，汉语通常是“数词+量词+名词”，而泰语则可能是“名词+数词+量词”或其他顺序。教学建议方面他提出，加强量词教学：例如，可以通过增加量词的教学时间、设计专门的量词练习等方式，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汉语量词；注重量词与名词的搭配训练：例如，可以通过设计量词与名词的搭配练习、提供量词与名词搭配的例句等方式，帮助学生理解量词与名词之间的搭配关系；提高学生对量词语义的理解能力，例如，可以通过解释量词的语义特征、提供量词的同义词和反义词等方式，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量词的语义。

张赫（2009）在《类型学背景下的汉泰语量词语义系统对比和汉语量词教学》中根据类型学分析量词语义的主要语义参项，分别描写并对比了汉、泰语量词系统的语义层级体系，找出了汉、泰语量词系统共有的和各自特有的分类，研究表明，汉语的指人量词很不发达，指人名词一般与通用量词“个”搭配，泰语的指人量词比汉语丰富得多，指人名词与动物名词、无生物名词的区分十分严格；汉语没有可专用于所有动物的量词，部分动物名词与专门的动物量词“头”搭配，部分动物名词与通用于动物名词和无生事物名词的量词“只”、主要用于无生事物的形状量词“条”搭配。而泰语对动物名词与无生物名词的区分也比汉语严格，例如，泰语则有专门的动物量词“ตัว[tua]¹”，虽然这个动物量词有用于无生事物的用法，但那是由动物量词用法扩展而来的，“ตัว[tua]¹”本质上是个动物量词。在有生与无生的区分上，汉语与泰语的手段不同，泰语把人类、动物的有生特征都明确地标识出来，而汉语则是对无生事物进行了明确标识，对人类和动物名词则没有专门的标识，用通用量词标识，这和汉语中对暂时没有量词的事物名词的处理方式一致；汉、泰语都分别以圆形、长形、平面形为核心语义参项形成了系列量词，但这三个主要语义参项在两个语言里又分别结合了其他不同的语义参项，形成了不同的量词，使两个语言对这三个形状特征的事物的划分并不一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在教学建议方面，他提出对母语是量词语言的泰语学生来说，学习汉语量词有其优势，不需要花力气去建立量词范畴、用量词的意识，还可凭借泰语量词很快地习得汉语里相对应的、适用范围基本相同的或大部分重合的量词。但是泰语量词也会对泰语学生学习汉语量词产生负迁移。了解泰汉语量词体系的区别，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利用优势、减少干扰，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番秀英（2011）《汉语和泰语个体量词对比研究》研究表明，名词和动词是汉、泰语个体量词共有的主要来源，代词是泰语个体量词特有的来源；“联想取向量词”是汉语特有的个体量词，“拷贝型量词”是泰语特有的个体量词；“拷贝型量词”不是泰语系统中个体量词的原始现象，而是后来才产生的；量词范畴内部的每个成员的来源都具有一定的理据性。范畴之间，无论是典型成员、还是边缘成员，都跟派生出来的本义有某种关联。弄清了本义，就能了解同一范畴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对学生掌握汉语量词有很大的帮助；个体量词并不是我们传统认为的那样，只有计量或者分类的作用。量词除了用来计量之外，其最重

要的功能就是把无界成分变成有界。她认为,“有界化功能”才是个体量词的本质功能。根据这一功能致使汉、泰语泛用量词“个”与“๓๓33”可以语法化为助词的原因之一。引起汉、泰语泛用量词“个”与“๓๓33”语法化为助词的动因,除了“有界”、“无界”之外,还有“使用频率”和“主观性”的动因。在教学方面她提出,引起泰国学生出现偏误,主要有以下原因:母语的负迁移;目的语知识过度泛化;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教学误导。同时,提出以下教学对策:加强汉、泰语量词对比研究,运用对比方法来讲解汉语量词教学;培养学生使用“目的语使用者的思维”方式来学习;把握难点,安排“专题介绍”;改进教材,提高教学质量;适当地调整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减少语言僵化现象;应用多媒体技术来辅助教学,提高教学效果。

(四) 汉、泰量词核心维度对比分析

基于汉、泰量词的本体研究及现有对比成果,现将两种语言量词在核心维度的异同整理如下:

1. 相同点

语音特征: 在音节结构上,二者都有单音节量词,在各自语言中使用频率较高,能紧密附着于其他词,形成相对稳定的语音单元。

语法功能: 汉、泰量词都与数词紧密相关,在各自语言中通过与数词组合,准确表示事物数量或动作次数,都起到明确数量的作用。在句法结构中,汉、泰量词都有充当定语修饰名词的功能。

语义功能: 汉、泰量词基本语义功能都是表示事物数量或计量单位,都可根据语义特征分类。例如,个体量词、集体量词、容器量词、度量衡量词、不定量词、复合量词和借用量词等类别,泰语量词也有类似基于语义的分类,虽具体分类名称和标准有一定差异,但都体现对量词语义多样性的认识和划分。

语用策略: 汉、泰语量词的语用效果都高度依赖语境。如,汉语“一轮明月”中的“轮”通过形状描述营造意境,而“一轮比赛”中的“轮”则表示周期性事件,量词的选择需结合具体语境;泰语中的“แถว (排)”用于表示成行排列的事物(如“一排树”),但在描述人群排队时,需结合具体场景选择量词“แถว (排)”,同样体现量词选择对语境的依赖。

应用研究: 在语言教学与习得方面,汉、泰量词均属于教学难点范畴。针对泰语母语者的汉语量词教学与汉语母语者的泰语量词教学的实证研究都较少,在有限的前人研究中,都提出运用对比方法,通过对比汉、泰量词异同,帮助学习者理解量词在不同语言中的特点和用法,减少母语负迁移影响。



2. 不同点

维度	汉语量词	泰语量词
语音特征	语流中会发生同化、异化、弱化等音变现象	相关研究较少
语法功能	语法分布与功能相对单一，主要与数词组合，表数量、修饰名词。	语法分布多样，例如： “名一数一量”； “名一量一修”； “量一名” 等结构； 具备计量单位、指称单位、构词单位等功能。
语义功能	指人量词不发达，指人名词通常与“个” 搭配	指人量词丰富；指人、动物、无生物名词与量词搭配区分严格。
语用策略	语境适应性强，如 “个” 可广泛搭配人、物等多种名词	语境适应性较弱，同一事物在正式与非正式场合需使用不同量词。
应用研究	1. 教学练习设计丰富，涵盖语法、语义、语用多维度题型； 2. 针对泰语母语者的学习策略建议较丰富，如减少语言僵化现象。	1. 教学练习设计研究较少，未形成系统全面的练习体系； 2. 针对汉语母语者的学习策略研究不足，缺乏针对性建议。

因此，汉、泰语量词在分类、搭配、语用等关键层面既展现出共性特征，亦因语言类型（汉语孤立语与壮侗语族语）及文化认知差异呈现显著分化。二者均通过量词与名词的组合实现语义精确化及语用功能调节，但汉语量词以语义泛化、语境适应性及修辞灵活性为核心特点，其教学体系已形成系统性框架；泰语量词则受社会等级、性别及宗教文化影响，呈现严格的搭配规范性与语义专业化，相关研究及教学策略尚需深化。这些异同特征为汉、泰语量词对比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需结合对比分析与本土化习得规律，针对性解决泰国学习者在量词选择、语用功能习得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

（五）研究不足

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后发现，自《马氏文通》（马建忠，1898）开启对量词的系统探讨以来，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深入研究，成果斐然，在量词的分类、语义特征、句法功能以及语用表现等方面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如朱德熙，1982）。相比之下，泰语量词研究起步较晚，系统研究欠缺。尽管近年来随着汉、泰语言对比研究的兴起，泰语量词以及汉、泰语量词对比研究逐渐受到关注，但仍存在诸多局限，具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泰语量词系统研究不足：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研究目的和视角提出的分类标准存在差异，导致泰语量词分类较为混乱，给后续研究带来一定困难。如裴晓睿等《泰语语法》（2017）中提出两大类、五小类的分类法与泰国皇家研究所的《量词标准书》（2008）六类分类在具体类别和标准存在不同，这种分类上的不一致反映出泰语量词研究在基础层面尚未达成共识。

汉、泰语量词对比研究深度与广度欠缺：前人研究多集中在分类体系和语义对比方面，对语音、语法功能、语用策略等方面的对比研究不够全面。如，在语音方面，对汉语轻声变音与泰语固定声调的感知差异缺乏量化分析；在语法功能方面，对于汉、泰语量词在句子结构中的位置差异对句子语义和逻辑关系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二语教学策略薄弱：针对汉语量词泰国学习者在量词应用方面研究不足，教学过程中忽视量词在实际语境中的运用和语用功能培养，未通过实际语境让学生体会量词选择的依据和语用效果，导致学习者难以准确运用汉语量词；针对泰语量词中国学习者的研究成果较少，对学习者在学泰语量词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偏误分析不足，缺乏对泰语量词教学策略的系统研究，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缺乏科学理论指导。

因此，汉、泰量词研究及对比研究呈现“汉语量词研究成熟，泰语量词研究滞后，对比研究不足，教学策略有待改进”的现状，未来需进一步加强泰语量词的系统性研究，在语音、语法、语用策略方面继续深化夸语言对比研究，不断完善针对泰国学生汉语学习者与中国学生泰语学习者二语教学领域中的不足，通过理论整合与本土化教学实验，推动汉、泰量词教学的科学与系统化发展。

三、对汉、泰量词教学的启示

基于当前汉、泰量词研究在理论体系、对比深度及教学应用上的不足，结合中泰学习者的语言特点，可从师资、资源、技术、实践等多维度构建系统化汉、泰量词教学体系：

（一）打造复合型教师队伍

开设“国际中文教育 + 泰语”联合培养课程，着重提升教师汉、泰量词的跨语言对比分析能力。定期组织教学研讨活动，分析中泰学习者在汉、泰语量词使用中的典型偏误案例，如量词与名词搭配错误、量词遗漏等问题。通过案例研讨与经验分享，助力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精准识别学生问题，制定有效教学策略，为汉、泰量词教学提供专业人才支撑。

（二）构建专用语料平台，深化对比研究

建设汉、泰量词语料库，广泛收集汉语和泰语的口语、书面语语料，以及中泰学习者的汉语量词使用偏误语料。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量化研究汉、泰量词在不同语境下的使用频



率、分布规律和语义功能。深入挖掘中泰学习者因母语迁移、文化差异导致的偏误类型，例如泰语量词分类体系对汉语量词学习的负迁移影响。通过系统的语料分析，为教学设计、教材编写提供科学数据依据，补充汉、泰量词对比研究的实证不足。

(三) 开展情境化分层教学，突破习得难点

语音方面：制作《汉泰量词语音与形式对照表》，结合发音示范、书写展示等方式，直观呈现汉语量词轻声变音、儿化现象与泰语固定声调、特殊书写形式的差异。采用模仿跟读、书写练习等方法，让学生感受并掌握汉、泰量词在语音和形式上的特点。设计“量词辨音辨形游戏”，通过听辨、书写含不同量词的汉语和泰语句子，强化学生对量词语音变体和书写形式的判断能力。

语法语义功能方面：实施阶梯式教学，初级阶段通过“量词与名词搭配卡片游戏”，帮助学生掌握汉语量词与名词搭配的基本规则，对比泰语量词在句子结构中的位置和搭配特点。中级阶段开展“量词连用与语义叠加练习”，对比汉、泰量词连用规则，找出汉、泰语相应表达在语义和语用上的差异。高级阶段利用“语义网络图”可视化汉语量词的多义性，通过“语境填空”任务，结合汉、泰情境图片，让学生选择合适量词并解释文化差异。

语用文化层面：对比汉、泰量词在表达、策略等方面的差异，通过角色扮演模拟不同身份对话场景，如商务交流、社交聚会等，让学生掌握汉语量词与泰语相应表达的使用规范；解析汉、泰量词使用的文化禁忌，避免文化误判；引入泰国官方文书、文学作品和日常对话语料，对比泰语量词在书面语和口语中的差异，对应汉语量词在不同语体中的用法。

(四) 开发本土化智能教学系统，实现个性化学习

基于汉、泰量词教学需求，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本土化智能教学系统。系统具备智能诊断功能，能够精准识别学生在汉语量词使用中的问题，如量词与名词搭配错误、量词遗漏等。实时反馈个性化学习建议，并推送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内容，通过形成“诊断—反馈—强化”的个性化学习闭环，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有效提升教学效率和学习效果。

结论

本研究系统梳理了汉、泰量词的研究现状，通过对比分析揭示了二者在语音、语法、语义及语用等核心维度的异同。研究表明，汉语量词研究已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而泰语量词研究起步较晚，系统性不足，汉、泰量词对比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均存在欠缺，二语教学策略亦显薄弱。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打造复合型教师队伍、构建专用语料平台、开展情境化分层教学及开发智能教学系统等策略，为汉、泰量词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未来，需进一步深化汉、泰量词对比研究，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通过多学科方法与技术手段，补



充完善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切实提升汉、泰量词教学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助力中泰语言文化交流迈向新台阶。

参考文献

- 番秀英. 汉语和泰语个体量词对比研究. [D].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9.
- 侯友兰. 量词重叠的语法语义分析. [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03): 56 - 61.
- 何杰. 现代汉语量词研究.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1.
- 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 [M].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4.
- 李宇明. 汉语量词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 刘祥友. 对外汉语偏误分析. [M].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2.
- 刘月华.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 陆俭明.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2.
-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马建忠. 马氏文通. [M]. 北京: 商务印刷馆, 1898.
- 马庆株.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 [M]. 安徽: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欧阳晓芳.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偏误分析.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 裴晓睿. 泰语语法新编.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依常生. 泰语量词的语法分布与语法功能.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 邵敬敏. 现代汉语量词研究.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 石锋. 汉语语音习得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 [M]. 北京: 商务印刷馆, 1985.
- 邢福义. 汉语语法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5.
- 袁焱. 汉泰名量词比较研究—从泰国学生偏误谈起.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01): 81 - 85.
- 赵元任. 中国话的文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8.
- 张赓. 类型学背景下的汉泰语量词语义系统对比和汉语量词教学.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9, (04): 78 - 88.
- 朱德熙. 语法讲义.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郭锐. 现代汉语词类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丁声树等.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 安家丽·辛诺伊 (Unchalee Singnoi Wongwattana). 泰语名词分类标记. [J]. 亚洲社会科学
与人文研究, 2016, 22(2): 117 - 121.
- 巴维斯 (Barwise, J.) 库珀 (Cooper, R.). 广义量词与自然语言. [J]. 语言学与哲学, 1981,
(02): 159 - 219.
- 乌冬·瓦罗塔玛西卡迪特 (Warotamasikkhadit, U.). 句子与动词短语分类. [J]. 泰国皇家
学会, 2010, (02): 60 - 68.
- 贾图荣卡乔克 (Jaturongkachoke). 分类词与准则违反. [J]. 学习, 2019, 12(2): 1 - 13.
- 基南 (Keenan, E.) 斯塔维 (Stavi, J.). 自然语言限定词的语义特征刻画. [J]. 语言学与
哲学, 1986, (03): 253 - 326.
- 丽莎·马修森 (Lisa Matthewson). 量化与跨语言变异的本质. [J]. 自然语言语义
学, 2001, 9(02): 145 - 189.
- 米斯里 (Meesri, W.) 猜翁 (Chaiwong, W.). 素可泰碑文与现代用法中量词的差异. [J]. 社
会与社区发展, 2024, 11(3): 705 - 726.
- 约翰·莱昂斯 (John Lyons). 语义学 (第一卷&第二卷) [M]. 伦敦: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7.
- 泰国皇家研究所 (Royal Institute of Thailand). 量词标准书. [M]. 曼谷: 泰国皇家学院,
2008.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LI BIN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Master's Graduat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Linguistic Studies
	Address (地址):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18/18 Debaratana Road, Bangplee District Samutprakarn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YANG XUMING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Ph. 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School of Literal Arts,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P.R. China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